

从容闳、郑观应、孙中山看香山文化

冯祖贻

一、香山近代名人——为香山增荣，为祖国添辉

在祖国南海之滨，有一个叫香山的地方，这里河道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又面临大海，自古以来，农业、渔业便很发达。公元1152年（南宋绍兴二十二年）正式建县以来，凭借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有清一代，200余年中，香山通过科举考试，出过探花2名，进士107名，举人721名，贡生、监生589名。

明中叶以后，香山县南部被葡萄牙占领；鸦片战争后，隔珠江口与香山遥遥相望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香山又成为西方文化向全国传播的重要通道。更多的香山人近赴港澳谋生、求学，更远的则远渡重洋，去南洋、欧美，这些去港澳或国外的香山人，亲身体验了西方文明，成为中西文化传播的桥梁。在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背景下，香山出现了一批名人，成为中国那个时代的先驱者，著名的有郑观应、容闳、孙中山等。

郑观应（1842—1922），香山雍陌乡人。他是一位买办出身的民族资本家，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完整维新思想家的启蒙者。他的出身很值得我们注意，香山因为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是所谓的“买办之乡”。与郑观应稍早或同时的一批著名买办，如唐廷枢、徐润都是香山人。唐廷枢、徐润都因熟通洋务，而被洋务大臣曾国藩招致门下，出任过著名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的总

办、会办；唐还是我国最早自建的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的开办者。郑观应由同乡的导引，一开始也在上海当买办，但没有多久，同样走上唐、徐之途，进入曾国藩洋务企业，先后担任上海织布局会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最后由盛宣怀保举，担任汉阳铁厂、粤汉铁路总办。

郑观应与唐、徐相比，更富有一腔爱国热情，到上海后，他“究心政治、实业之学”，通过对西方政治和工商业的考察和思索，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①这是他一生的自我总结，也即是“攘外”即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置于第一，为达此目的，必须“自强”、“致富”；为“自强”、“致富”，必须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为使自身工商业发展，又必须大办教育，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提高国民素质，最终归结为改善政治制度。郑观应的认识在当时是先进的，从主张自强致富进而延伸到政治制度的改革，已可将他从洋务官僚中分列出来。郑观应的变革维新思想形成很早，从19世纪70年代的《救时揭要》开始，经80年代的《易言》，到90年代的《盛世危言》各种版本。^②《盛世危言》一书的影响几乎跨越了时代，维新派、立宪派人士读它，革命派人士也读它，甚至一批共产党人早年也曾从这本书中汲取过营养。

在中国近代史上为香山赢得重要声誉的还有容闳。容闳（1828—1912）是香山南屏乡人，南屏离澳门只有四里余，容本人是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因家中离澳门近，父母希望儿子能学习洋文，以便在洋行中谋差，7岁便送他到澳门郭士立牧师夫人所办学校就读。此时另一位美国牧师布朗正在澳门开办马礼逊学校（后迁香港），此人“实为中国创办西塾之第一人”^③。征得容闳母亲同意，容闳得以入学，从此容闳的命运发生根本转变，随布朗由马礼逊学校转赴美国，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四年后毕业，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章开沅先生曾对容闳的生平做过这样的概括：“容闳生平事业有四大端：协助建立江南机器制造局此其一；倡导并率领幼童赴美留学此其二；参与维新变法此其三；促进革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② 据夏东元先生统计，《盛世危言》一共有23个版本，另有各种翻印本不知其数，见夏东元：《郑观应传·附表》，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

命运动此其四。这四件事都是开风气之先，都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才干，才能在专制高压、封闭守旧的社会环境中有所成就。”^①这个评价可谓中肯。即以开创幼童留美一事而言，其遇到的阻力与困难就不计其数，但终于被容闳办成了。从1872年到1875年，容闳共率四批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这120名幼童中，后来当总理的1名，部长的2名，公使的2名，海军将官、舰长的8名，大学校长2名，另外大多在铁路、电报、海关、工矿业从事技术及领导工作。在任海军军官的幼童中，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为国殉难的就有8人。留美幼童中，香山人就有39名，几乎占全部幼童的三分之一，著名的就有唐绍仪，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梁如浩先任侍部，民国后任总长；唐国安，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蔡廷干，任海军中将。此外唐元湛、梁金荣分任上海、江西电报局长……以是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仅这一方面的成就，足使容闳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使香山获得更大声名的是孙中山。孙中山（1866—1925）为香山翠亨村人，自幼参加农业劳动，1878年随母亲赴檀香山哥哥孙眉处，接受了西方教育，后回香港，就读西医书院，1894年曾北上上书李鸿章，“步武泰西，参行新法”，但遭拒绝，愤而投身革命。同年底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团体兴中会，次年又在香港又建立总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发动广州起义。1900年又发动惠州三洲田起义。1905年成立同盟会被举为总理（同盟会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学说。之后在1906—1911年又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1911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给予清政府打击最大。武昌起义后，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虽被迫交权给袁世凯，但仍坚持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为彻底打倒军阀和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列强而不懈斗争。1924年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吸纳共产党员参加，为以后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孙中山一生是不断革命和追求真理的一生，无愧于“革命先行者”称号。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行动，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同时也在亚洲乃至世界产生了重

^① 章开沅：《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序言》，珠海出版社1959年，第1页。

大反响，香山因此而改名中山。

我们在这里仅举出郑观应、容闳、孙中山这三位原籍香山的近代名人。其实香山的名人还有许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站在时代前列，统领时代潮流，因此创造了不少中国近代的“第一”。香山应为诞生这些闻名遐迩的名人而骄傲；名人为香山增荣，也为祖国增辉。

由众多名人构筑起的名人文化，应是香山文化的重要部分。因为在名人身上集中体现了香山文化的精粹，足可为后人效法、学习；由名人的效应，也将香山文化得到进一步提升，远播全国乃至世界。

二、名人的生活、成长背景——香山的地理、人文环境与时代召唤

香山出了不少中国甚至世界级名人，这与他们生活、成长的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

李约瑟曾经说过：“地理背景——演出中国文化发展这出戏的舞台。实际上，地理因素不仅是一个背景……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① 如果我们将眼光缩小，来看中国各个地域文化，那么香山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显然与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关。

香山位于珠江入海口西岸，背靠富庶的珠江三角洲，面对浩瀚的南海。梁启超曾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属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② 因之自宋、元以来，香山人因各种原因远离故土而往海外谋生，香山成为著名的侨乡。这个位置也为外国殖民者所觊觎，自明中叶以来，葡萄牙人便看中这个地方，进而占领了它的一部。因此香山是中国最早领受了外国殖民者侵占中国领土、遭受屈辱的地方。事物总有两面性，西方殖民者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如此之大，不能不使居住在这里的香山人在经

^①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转引自《中华地域文化集成》，群众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6 页。

^②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受外来文化冲击后产生思考。可以说，香山人是最早经历了中西文化冲撞的中国人。

这在三位名人身上都有体现。郑观应可说是有一定儒学根底的人，父亲还是乡村塾师。他与同代的香山人一样，早早外出谋生，先在上海洋行当伙计（这是为当时人所不齿的行业），但他刻苦自学外语与西方经商经验，在成长过程中又广泛阅读中外书刊，终于形成了他力主学习西法、富国强国的维新思想。容闳与孙中山都有西方教育背景，容闳还是耶鲁大学毕业生，他接受西方文明后即打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 孙中山一开始也有这种想法，所谓“以中国人民之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② 可贵的是孙中山没有就此止步，他认识到腐朽的清政府及封建制度已不可能将中国引入富强之路，只有效法西方资产阶级先辈们鼓吹的革命才能彻底解救中国。这三个人都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富国、强国、救中国，是他们追求的理想，郑观应的贡献在于他摒弃了洋务派只重视“器”模仿的局限，而提出了学习西方制度、思想，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容闳则在这条路上具体实践着郑观应提出的主张，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孙中山早期同情改良，但很快便转向革命。待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自是核心人物，容闳力表支持，郑观应则走到革命的对立面。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太快，转瞬间，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就落伍了。但这三个人之间递进的轨迹是十分清楚的。像接力棒一样，他们都在中国近代这个剧烈转变的年代的各个时断中扮演着精彩的角色。在一个县域范围内，能出现完整、典型地体现中国近代历史转变，中国文化思想转变，并具有全国影响和世界影响的代表人物，恐只有香山一个。香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可以想见；香山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地位亦可以想见。

地理与人文环境影响还不足以产生杰出人物，因为它只是“背景”，只是“舞台”。时代的召唤、个人的禀赋在某种程度上才是最重要的。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各民族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感危机的紧迫，处于风口浪尖的香山人会更有紧迫感；如何挽救祖国的危亡，如何求富国、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强国之策，便摆到了全中国人面前。谁能交出优秀答案，谁就能站在时代的前列。位于珠江三角洲、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广东人是幸运的，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先进者，而处于三角洲最前沿的香山人又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里，时代的召唤又与地理、人文环境结合在一起。历史告诉我们，仅有时代的召唤，而缺乏产生引领历史前进伟人的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是无可奈何的；仅有优越环境而历史尚未进展到重大转折的关头，也产生不出名标青史、震烁千古的伟人。是中国近代这个特殊历史条件和香山独有的地理人文背景相结合才孕育和培植了像郑观应、容闳、孙中山这样的伟人，是时代让香山脱颖而出，而香山也没有辜负伟大的时代。

三、从名人看香山文化的特征——名人生于香山和走出香山

从香山近代名人，可以看到香山文化的特征。

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说：“文化行为是地域的，人所作出的、千差万别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穷尽它的重要意义。”但“文化行为同样也是趋于整合的”，由于“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使“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通过最不可设想的转变，体现了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①香山三位名人的事功，从文化学角度，都可称之为“文化行为”，三个人的事功并不完全一致，所处年代更有先后，但在“紧迫”的近代环境中，完全可以“整合”在香山文化之内，成为香山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体现了香山文化“独特的目标特征”。

从名人身上体现的香山文化独特目标特征，首先是爱家、爱乡和爱国。

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亚文化或子文化，岭南文化按语言上分就有三大块：粤语、客家、闽语，香山也是这样。这三大语系，都与移民有关。粤语是最早一批中原移民南下与原有土著南越人语言的混合；客家则是两晋以后中原移民的后裔；闽语是中原移民先迁福建又转到广东与当地居民的混合。众所周知，中原移

^① 本尼·迪克特：《文化的整合》，《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民的南下，往往是举族而迁，岭南文化中宗族与家族的色彩异常浓厚，香山文化也同样有这个特点，三位名人中二位都有确凿的宗系可寻，正反映了这一文化特征。中山市超万人以上的大姓有 26 个，许多聚族而居的村落至今尚在，家谱历历可数。在中国儒家传统中，甚至在语言中，“家”与“乡”密不可分，“家”与“国”更是可以相互通借，形成“家国同构”。由爱家（族）、爱乡，走向爱国，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优秀传统。自葡占澳门以来，香山人就为家族土地不断被侵略者霸占而展开斗争，1894 年香山义民甚至杀死当时的葡萄牙驻澳门总督阿玛勒。随着国势日蹙，香山人逐步走出家、乡的小圈子，走上了思考如何挽救国家危亡的路子，郑观应、容闳、孙中山就是其中杰出代表。本尼·迪克特还讲过一句话：“我们只有首先理解了一个社会在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导潮流，才得以理解这些行为所取的形式。”^① 香山人在情感上和理智上主导潮流就是爱家、爱乡、爱国，所以在他们杰出人物代表身上的种种爱国主义行动，我们就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在近代杰出人物身上，我们还能看到香山文化的开放性。开放尽管不是文化的“目标”，但却是香山文化的特征。

文化的开放，要求的是某一地域文化不仅对本地区的其他类型文化持平等、宽容的态度，而且对其他外来的异质文化也要平等、宽容并善于吸收其长处。如前所述，香山境内就有三种语系的文化，各语系之间千百年来和睦共处，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现今只有从语言上还能较明显区分三种不同的文化，其他如风俗习惯上已基本融为一体。对待西方文化，香山文化更表现了它海纳百川的气魄。即以建筑文化论，如今在中山市的旧城区仍可看到旧式的洋楼，鳞次栉比，它既保留了中国民居的固有样式，又吸收了西方建筑的长处，初看，觉得不洋不土，细看，却有种种优点，这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建筑样式，正是香山人对两种不同建筑文化选择、融合的结果，两种建筑文化初期结合上也许有生硬之处，但却表明了香山人在文化心态上决不保守，决不故步自封。香山近代名人，无论是郑观应、容闳或孙中山，他们都具有这种宏大的气度，敢于把西方优秀文化成果

^① 本尼·迪克特：《文化的整合》，《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5 页。

拿来为己所用，所以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事业。他们的开放心态，成为那个时代的榜样，也必将激励今天香山文化圈中的居民，去创造文化的更加辉煌。

香山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的目标特征是创新。

郑观应、容闳、孙中山都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创新者。郑观应看到洋务派学习西方的不足而提出从教育、政治、法律等领域的革新，在当时因循、保守声浪中是石破天惊；容闳以一个留洋的知识分子身份为太平军献计献策，又亲自策划领导了中国幼童留美，作出了人们未曾想过的事；孙中山组织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第一个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最后领导全国人民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是伟大的创举。不仅如此，在工商业领域，中国第一家水泥厂、近代最大的煤矿、自建的第一条铁路、第一台蒸汽机、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民营机器印刷厂都出自香山人之手。至于由香山人开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更创造了中国百货业史上的多个第一。有人统计，香山近代以来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艺、医学等领域，荣膺某一领域“第一”的名人就有近30位。^①香山不愧为创新之乡，创新之都。

创新是决定一种文化有无活力，有无前途的决定因素。创新必须要求人们能除旧，大胆舍弃一切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旧事物、旧思想；要舍弃，自然会有斗争，不仅要否定过去的自己，更要与周围的一切陈规旧律进行斗争。在近代伟人身上我们正看到香山人在文化性格上的特点：抱定既定目标，坚忍不拔，顽强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由香山文化哺育的近代名人们做到了，我深信，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样在香山文化哺育下成长的今天香山人也一定会沿着先辈足迹，创建更加美好的香山未来。

近代香山名人决非仅属于香山的，同时也属于全中国，他们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体现者。即以我们所述三位名人论，他们的事业、成就都是走出香山才完成的，郑观应离开香山去上海时年仅15岁，容闳赴美时也只有19岁，孙中山到檀香山时才12岁，可见更宽广的舞台才是他们建功立业、大显身手的天地。这

^① 参见崔国潮：《香山文化：中山发展的精神动力》，《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胡波：《简论中山名人文化》，《开放时代》2005年（增刊）。

给我们一个启示：研究香山文化决不能脱离华南文化和涵盖全国的中华文化；同时近代名人也激励我们今天仍生活在香山文化圈中的后人（包括中山人、珠海人、澳门人），生在香山，要走出香山，放眼全国，走向世界。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